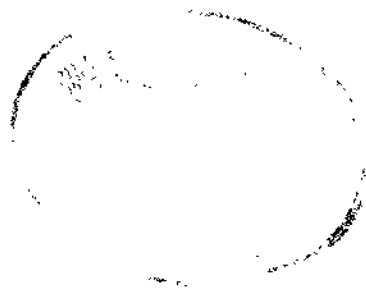


2. 3. 12

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 十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南溪县委员会编

7.

44204/16

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南溪县委员会编



郭伯和烈士遺像



胡明鑫烈士遺像

第十辑目录

- 一、怀念郭伯和烈士…………… 肖金芳（1）
- 二、一次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在南溪李
庄的兴起——记同济大学声援昆明“一
二·一事件”的斗争—— 蒋德心张跃棠肖荣铮（6）
- 三、省宜中在李庄时党的组织与活动情况…
…………… 中共南溪县委党史办公室提供（12）
- 四、南溪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 民政局提供资料 文史办公室整理（19）
- 五、揭露司法员潘英多贪赃枉法的快邮代电
…………… 张质夫烈士遗稿（88）
- 六、控告周锐校长呈省文…………… 张质夫烈士遗稿（90）
- 七、四川省国民教育巡回辅导团第一团的活
动情况…………… 包楷文（93）

怀念郭伯和烈士

肖金芳

郭伯和烈士名象豫，四川省南溪县人。是在孙炳文烈士的影响下，迅速成长起来的进步青年之一，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被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伯和烈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之一，他的牺牲对党对人民都是极大的损失。因为他是我的小同乡，又与我两度同学，有过不少的交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特作如下忆述，

烈士和我的接触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间，我在南溪县立高等小学校第五班读书，那时伯和同志也在该校，但高我一班。我们最初并无往来。一九一六年冬，学校举行追悼会，悼念蔡锷将军。为此，我拟就一副挽联：“国贼已灭身忽死；革命垂成志更坚”。他以毕业班同学代表身份主持那天的大会，对我所写的挽联很赞赏，而我也非常钦佩他成功地主持了大会。这样，我们才开始往来，逐渐成了莫逆之交。

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我们在四川省立第三中学

(在江安县)再度同学，我们间的友好关系也就更加亲密。我们与另一个与我同班的同学陶思骏(字尊民、俊民、即刘鼎)不仅一直同桌吃饭，而且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议论自己的未来和世界的明天。我们三人曾有过共同的雄心大志，长远的宏伟规划，激动人心的幻想，并为四川英雄辈出的革命传统而感到自豪。我们心目中最崇拜的人物有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因谋刺摄政王未遂的黄复生，黄花岗之役的生还勇士喻培棣和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并受中山先生器重的杨庶堪。“五四”运动爆发后成立的“四川省立第三中学爱国救亡学生会”，就是我们三人的联络而组织起来的。

一九一九年七月，我离校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伯和同志也出川赴沪，进入上海大学。由于我俩不在同一个地方，我在国外，他在国内，同时又各自忙于学习或是为生活而奋斗，我们也就逐渐失去联系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我从法国归来，回到上海。在南京路上碰见小学同学欧阳鑫(字竞文)，他当时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作。从他那里获悉伯和同志已在上海大学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担任着上海大学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的职务。为了便于谈话，即由竞文同学出面，约伯和我于一天晚上到北四川路，一家广东饭店会面。我们边吃边谈了一个多钟头。那时北伐军尚未到达上海，但伯和同志非常乐观，很有信心。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上海的形势。他说在国共合作的基基础上，人民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尤其是工人已经有了相当完备和严密的组织，并作好充分准备周密布置来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我们除简单地告诉对方各自

在过去七年中的情况外，也谈了自己对当时国内外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还问我在法国经常跟那些人来往，我回答他由于同乡、同学等关系，我跟秦治谷（即秦青川）、熊雄、熊自难、夏庭、赵世炎、王若飞、吴大璋、吴震环等同学接触较多。他问我在外国是否见过周恩来、孙浚明（即孙炳文）和朱玉阶（即朱德）。我说朱、孙二人于一九二二年到法国，起初住在枫丹白露，我却在里昂，迨我回到巴黎时，他们又已去了德国。尊民是后来孙浚明二次出国去德国时一道去的，似未经过巴黎。因此没有机会碰面。最后他问我回国后有何打算。我说我是研究法学和国际问题的，希望能够在外交或教育方面做点事情。他听了以后，勉励了我一番，盼我早日来沪，并肩战斗。由于他很忙，我也急于回家省亲并已订好第二天开往重庆的直航船票，我们也就匆匆告别，相约两个月后在上海再见。

在我回家的途中，路过万县时，意外地受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的特殊礼遇，情不可却，又因朱德、秦青川、陈毅等同志都在那里，我也只好留在那里做了一阵工作。所以跟伯和同志失了约，未能在两个月后返回上海。等我到上海时，已是八、九月间，我再也不能与他相见了。

工作至牺牲

一九二七年三月，共产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和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组织部长赵世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伯和同志以闸北区委书记身份参加指挥。起义分七个区同时进行。闸北区是起义的关键区，那里不但有军警据点

二十多处，而且有直鲁联军驻守上海的毕庶澄部三千多人集中在北站一带，其中有原张宗昌的雇佣军——白俄铁道装甲车队，这个装甲车队还配有迫击炮。而闸北的工人纠察队的配备也比其他各区较强。伯和同志指挥下的主要骨干工人纠察队包括商务印书馆、邮政、电气、铁路等企业的主力，并有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的三个学生纠察队。当时闸北区的纠察队所掌握的武器也比较多，计有长短枪五十余支及其他土炸弹、铁的工具等。激烈的战斗发生在闸北区，闸北区的战果也最为显著。

“四·一二”以后，周恩来同志和罗亦农同志秘密化装赴武汉出席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罗亦农同志调离上海，由原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同志任江浙区委书记，郭伯和同志升任江浙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仍为赵世炎同志。

六月，江浙区委撤销，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江苏省委仍驻在上海，并以上海工作为重点。浙江省委决定九月成立。

六月二十六日的上午，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恒丰里82号或104号召开江苏省委成立会议。会上，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同志传达中央指示决定：陈延年同志任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同志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赵世炎同志调中央机关工作，但因上海业务繁重，虽经多次催促，迟迟未能动身，也未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开始不久，一位同志前来报告，说有一个交通被捕，而这个交通知道这里的地址，应该迅速转移；但王若飞同志认为敌人还不会来得那么快，会议加速进行。会议很快结束后，大家加速离开会场。午饭后，延年、伯和两同志和

韩步先一起回到恒丰里，看看没有动静，便坐下来讨论问题。这时敌人已经包围了恒丰里，他们三人都被捕。延年同志被捕后由世炎同志代理其职务，七月二日，世炎同志也在四川路志安坊190号住处被捕。

世炎，延年和伯和三位同志相继被捕后，虽然遭到严刑拷打，但在敌人面前，都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党也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进行营救，但由于叛徒韩步先的出卖与对世炎同志两次指证，三人终于在龙华英勇就义，后来连尸体都未找到。

郭伯和烈士牺牲日期不详，有多种说法：

一，据一九二九年党刊《牺牲》杂志载：伯和同志就义于七月三十一日。二，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管理处负责人根据当时报载最近面告：伯和同志与延年同志二人于七月四日深夜在警备司令部东约二、三百米处的乱坟堆里被枪杀。三，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当时闸北区区委委员黄逸峰同志的回忆：伯和同志与延年、世炎同志三人同于七月十九日夜被杀害在沪南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的刑场上。

注：本文系根据作者一九八一年六月所著《怀念郭伯和烈士》及一九八三年九月所著《郭伯和烈士在上海被捕和牺牲的情况》二文综合整理而成。

一次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在 南溪李庄的兴起

——记同济大学声援昆明“一二·一事件”的斗争——

蒋德心 张耀棠 肖荣铮

上海沦陷后，不愿当亡国奴的同济大学师生，流亡飘泊六次迁校。最后，到了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李庄是长江上游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除崎岖的山路之外，没有公路交通。只有每天一次往返宜宾和泸县之间的小机动船，途经李庄作短暂的停留，同外界联系。连成都、重庆的报纸和邮件也要一星期，有时甚至要十天以上才能到达。消息闭塞，政治空气十分沉闷，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控制了学校的训导处，擅立行政校规，钳制学生的思想。校内出版壁报，刊物必须经过他们登记审查批准。反动分子却活动猖狂，肆无忌惮地制造谣言、诬蔑、诽谤，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校门附近的一条街上，经常有三青团同济大学区分部的反共大字墙报和宣传印刷品，妄图独占舆论阵地。那时的李庄，真象一潭死水，然而“死水”不死，屹立在重庆的《新

华日报》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和平民主的呼声，仍如春风般透过墙缝，萌发着青年学生的心。同济大学声援昆明“一二·一事件”的斗争就这样在李庄爆发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李庄同济大学出现第一次群众性的学生反蒋运动。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后，国内出现严重的政治局势。蒋介石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的强烈愿望，加紧推行法西斯一党专政。一面利用美援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军；一面又在国统区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实行血腥的镇压，妄图独占胜利果实。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公然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团结的昆明学生和教师进行野蛮的屠杀。学生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吕华四烈士惨死在反动派的屠刀和炸弹之下，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

在李庄的张家后院里，住着张扩夫、廖世斌、曾伯勋、刘文瑞、王化愚、张跃棠、蒋德心等几个同济学生，他们是在蜀光中学高中同班毕业又同时考进同济大学，是一群向往进步，追求真理，愤世嫉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热血青年，有的人早就接受过地下党的教育和影响。十二月下旬，他们收到了登载着“昆明一二·一惨案实录”的《新华日报》。回到住所，聚集在厨房里准备晚饭时，蒋德心向大家朗读这篇饱含血泪控诉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的报导。当读到昆明学生于再等四烈士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和炸弹之下时，声泪俱下，大家愤慨不已，张扩夫、张跃棠不约而同的愤怒的高喊：“这是法西斯暴行！”“野蛮的屠杀！”“要在死水一潭的李庄公诸于众，揭露反动派的真面目！”……

当天晚上，他们聚集在微弱的油灯下，秘密商定：连夜动手出版壁报和油印报，刊名《暴风》，意思是要在李庄掀起一场风暴，冲破三青团、特务的反动宣传和封锁，反对国民党屠杀学生的法西斯暴行。大家推举蒋德心作主编，并负责写发刊词和社论；张跃棠负责刊头设计、版面和书写、油印等工作；大伙都分头动手写稿，经过三昼夜的秘密准备和工作，把《暴风》报编写出来了。壁报的刊头，画的是一只巨大的拳头在黑雾中举起，下面还有挣脱了的锁链、打断了的画有“卐”法西斯标记的屠刀。发刊词公开宣称：我们的目的是要和平，要民主，要团结，反内战。社论标题是：“不许昆明当局屠杀学生”。除吊唁一二·一死难烈士，声援昆明同学的斗争外，还这样写道：“奉劝蒋委员长要以和平民主团结为重，严惩肇事的部下，以谢国人，不要再玩弄希特勒的故伎了”。壁报还全文转载了新华日报的“一二·一惨案实录”；刊登了张扩夫、张跃棠、方世口等人悲愤激昂吊唁死难烈士的覆文和慰问信等。《暴风》壁报共两大版，加了通栏标题：“沉痛追悼一二·一死难烈士！反对昆明当局屠杀学生！”为了防止特务学生的破坏，这期壁报是张贴在两张大篾席上的，以便白天挂出去，晚上取回来。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又商得蜀光中学校友会会长唐仕堵的同意和支持，用了蜀光校友会会刊《暴风》社的名义，正式向学校训导处填送了登记表，《暴风》社社长：唐仕堵；主编：蒋德心；主办者：蜀光校友会……。

一九四六年元月二日清早，《暴风》壁报在李庄大街上挂出来了，接着缩编的油印版也散发了。真如一阵暴风似的，顿时将李庄这一潭死水掀起了狂浪。一连几天，争着阅

读这张壁报的人络绎不绝，站满了街头。《暴风》报的内容一时成为广大师生和李庄市民传诵的新闻。这一行动很快得到了在李庄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组织的积极支持。在他们的推动下，许多团体、同学会、同乡会甚至助教协会，都纷纷起来声援昆明同学的斗争，有的团体还发起募捐，写慰问信，在同济大学兴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学生运动。

这时，反动派如临大敌，大为惊慌。对办《暴风》报的几位同学，恨之入骨。派特务密探进行监视，明查暗访。张家后院的汪婆婆关心这几位同学的安全，偷偷告诉他们：

“接连几天都有鬼头鬼脑的人来查访你们的行动……”这几个同学也发现自己的信件被邮检，有时还收到封口湿润的信件。接着，反动当局采取了恐吓和压制措施。大约是元月十日左右，训导处挂出了开除蒋德心、唐仕培学籍命令的牌告：“查学生蒋德心、唐仕培假借蜀光校友会名义，违反校规，出版《暴风》壁报，阴谋暴乱，反对蒋委员长，着予开除学籍，此布。训导处（章）。”

斗争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地下党员肖荣铮，王冰泉两人将蒋德心、张扩夫叫到他们的住处，鼓励他们坚持斗争，注意安全，出入要结伴同行，并表示要立即组织同学起来抵制训导处的倒行逆施。这大大增强了他们坚持继续斗争的勇气。果然，南开中学校友会首先发表声明，响亮的提出：

“要同兄弟学校蜀光中学校友会同生死，与《暴风》社社长和主编共患难。”肖荣铮等宜宾同学办的《宜风》壁报，王冰泉等人办的《民锋》壁报以及许多团体都发表了类似声明，一致谴责训导处，要求撤销开除令。助教协会也公开批评训导处的错误作法。在同济大学的全体蜀光校友几十人，

齐集在训导处门前示威，展开了同反动当局的面对面的斗争。大声质问并据理驳斥训导处：“《暴风》壁报是全体蜀光校友办的，你凭什么说是假借蜀光校友会名义？”“言论自由，出版《暴风》又经过登记，凭什么说是阴谋暴乱？”

“强烈要求立即取消对蒋德心、唐仕堵的开除令！……”反动的训导长蛮横无理，说什么“办壁报取名‘暴风’，内容污蔑蒋委员长，妨碍军令政令的统一，就是企图暴乱……”

引起在场学生的哄堂大笑。这场斗争，从早上八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最后训导长仍然坚持要蒋德心、唐仕堵悔过才肯撤销开除令，但遭到蜀光校友会全体同学的一致拒绝。训导长无计可施，又了要另一套花招，想查出所谓共党分子。他找了一位医学院的蜀光女同学杨绍先个别谈话，对她说：“你们当中有个别人是共党分子，你可不要被他们利用呵……”。杨绍先理直气壮的回答：“‘一二·一’屠杀学生就是法西斯暴行，壁报是我们大家同意办的，我是举手赞成的。”弄得训导长瞠目结舌，十分狼狈。但这个家伙仍不甘心，又找蒋、唐二人谈话，说什么：“唐仕堵不明真相是被利用，可以不开除。蒋德心是主编要负首要责任，要认错悔改才撤销开除令”。也遭到蒋、唐二人的当场拒绝。全体蜀光校友和其他进步同学都围在训导处门口，支持他们，斗争相持不下。这时校长徐诵明教授从外地回来，闻知此事，出面解决，徐叫大家先回去，此事由他负责处理。因为徐诵明校长是学者，为人正直，德高望重，大家相信他的话才散去。

第二天，徐校长决定取消开除令，训导处才被迫取下了在他们的办公室门前挂了几天的牌告。在广大群众的声援

下，斗争取得了胜利。好心的徐诵明校长出于师长的关心和爱护，同蒋德心作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说：“我取消了开除令，你可以继续读书，但我管不了他们（指特务），你要格外小心，如果觉得不安全，可以随时离校，转到别的大学去，完成你未竟的学业”。并当场给了蒋一张同济大学医学院一年级肄业期满的转学证明书。这一事件表面上平息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法学院的王冰泉在茶馆谈论到《暴风》报，并表示赞赏时，竟遭到三青团反动分子的围攻。

一九四六年七月同济大学复员，分批启程回上海。蒋德心为摆脱特务的纠缠和防止敌人的迫害，愤然离校，转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张扩夫、张跃棠、廖世斌等《暴风》报的主办者仍随校去到上海。后来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在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上，他们在党的领导下，都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并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斗争直到解放。

注：此文是蒋德心、张跃棠、肖荣铮共同的回忆录，由蒋德心、张跃棠起草，肖荣铮同志提供。

中共南溪县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省宜中在李庄时党的组织与 活 动 情 况

（在今年六月中旬，县委召开的党史资料专题座谈会上，应邀的几位老同志，介绍了他们在李庄的省宜中读书时，所知的学校党的组织与活动情况。现将发言记录整理于后，希知情同志补充。）

陈林昆同志讲：

我是一九三八年上期考入省宜中。省宜中是因躲警报才于一九三九年三月迁到李庄张家大房子的。在未迁来之前，我在省宜中初中部时，由刘万平介绍加入民先队。当时我是小组长，其他有周乃其、刘洪云、王学平，可能还有一两个人，不大记得清楚了。学校迁下来后，县宜中部份同志考入省宜中来，譬如张中贵、曾宪奎、樊海章、聂敬熙（是否是县宜中来的，记得不那么准）。这时，民先队主要由我与曾宪奎进行联系。先前阶段，主要是搞宣传，而且是利用寒暑假回到宜宾组织学生剧团。也就是说：一九三九年的正月初二·三，由赵怀碧带起到南溪演出，后来暑假又去横江、屏山、安边一带搞宣传。当时宜宾的抗日救亡团体比较多，而学生也组织有一、二个，如东路宣传队、学生剧团这些组